

西方学者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罗翠芳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西方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直接研究、整体研究很少,其相关性研究散见于其他专题研究之中。分析西方与此关联的论著,可以看到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内部的现代性在逐渐扩散。然而与此同时,也能感知到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以及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不足。总体看来,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

关键词:西方;中国;城市化;城市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4-0190-06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基本线索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① 不过,如果以这种观点来审视西方有关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论著,可能会有点失望。虽然,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成果非常多,却很少直接从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两个主题出发来论述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的发展。事实上,西方有关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很多论著的内容趋于微观,如果把这些论著纳入到城市化或城市现代化如此宏观命题中来,有点勉为其难。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想从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中了解西方人是如何看待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在“量”(城市化主要是从量方面来看的)与“质”(城市现代化主要是从质方面来看的)上的发展。

一、相关研究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动态,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回顾与述评。例如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安克强《19—20 世纪的中国城市与城市社会: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王迪《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以及熊月之与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等论著。不过,以上学术综述都没有从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这两条主线出发,而且其内容基本上也没有涉及西方对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行龙的《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一文,显得难能可贵,它对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成果有所列举,不过没有进一步展开^②。下面,先来看看西方有关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以及主要观点。

^① 目前学术界一般把“城市近代化”改称为“城市现代化”,故笔者在此采用“城市现代化”一词。

^② 类似文献有: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5 期;安克强《19—20 世纪的中国城市与城市社会: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城市史研究》第 23 辑,2005 年版;王迪《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魏楚雄《挑战传统史学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史林》,2008 年第 1 期;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熊月之、周武:《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版;Liu Haiyan and Kristin Stapleton:Chinese Urban History,China Information. Vol. 20, No. 3;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收稿日期:2010-09-29

作者简介:罗翠芳(1973-),女,湖北松滋人,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城市史、西方经济史。

二、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

其实,经笔者长期收集整理发现,西方有关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且真正直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常见的是,一些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有一定相关性的内容散见于其他专题研究之中,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或片言只语。下面,选取代表性成果进行说明。

(一)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

目前,西方文献中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当属特里瓦萨一文:《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1951),该文回顾了中外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人口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那一时期中国有 216 个中国城市,而且还以省份为单位进一步罗列出在 1922 年、1930 年、1937 年、1948 年、1949 年 5 个时间点上城市人口的不同统计数据^[1]³³⁷⁻³⁴⁶。

具体说来,该文回顾了西方有关中国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研究文献。例如,他认为第一个尝试列出中国城市及其人口数的书是斯托弗的《基督教在中国》,此书列出了 1922 年中国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数量,提出人口超过 25 000 的城市有 370 个。此后,第二个尝试列举中国城市数及人口数的是托尔加谢夫的一篇文章《中国城市人口》,此文大量引用斯托弗 1922 年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列出了 1930 年中国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数量。托尔加谢夫估算人口数超过 25 000 的城市有 467 个,当时城市人口总数是 50 301 500^[1]³³¹⁻³³²。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一文还罗列了当时中国人在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总量方面的统计数据。现在看来,尽管此文在城市数量及人口总数上的准确性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它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对于研究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中的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的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虽说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的主要内容与本文主旨关联不大,但是其附录 5 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 年)对于了解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人口变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在表附 5-1 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中,作者列出了约在 1900—1910 年间、20 世纪 20 年代初、1938 年、1953 年、1957 年、1958 年等时间段与时间点上,中国各省城市及城市人口,从该表中大致可以看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同一城市的人口变化轨迹^[2]³⁸⁸⁻³⁹⁵。

在西方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中,偶尔也能看到西方对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数有所提及。例如,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说,1925 年上海人口约有 230 万。1936 年,上海人口 330 万,北京 140 万,天津 130 万,汉口 120 万,广州 95 万,南京 65 万,苏州、杭州、福州、南昌各为 50 万^[3]卷首。但是,西方大多数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中的城市人口数据,都是引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的城市人口数据^①。

(二)中国城市化的相关提法

苏珊·曼的《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一文,从标题上看,是一篇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文章。其实,该文并没有具体探讨那一时期中国城市数量及人口,而是介绍中外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观点及看法。在该文中,作者介绍了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三个重要观点。其一是罗兹曼的集聚型城市空间模式。罗兹曼认为,中国城市层级结构的显著特征是人口和物资呈“底大”的不平衡分布。在乡村小镇与大城市之间的中等城市比较少。中国城市化指数与同一时期日本城市化比较,相对较低,这种城市层级结构与低城市化率,不利于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迈进。其二是施坚雅的城市平衡增长的空间模式。施坚雅把 19 世纪中国划分为几个大区域,来研究其城市化与城市特征,通过此种方法,他得出: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出现了比同一时期其他国家“更平衡”的发展模式。如此看来,施坚雅与罗兹曼的观点决然不同。最后是墨菲的通商口岸模式。墨菲认为中国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有一定影响,但是

^① 例如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版)中第 19-20 页,韩起澜著,卢明华译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 页,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1 页,等等,所列出的城市人口数,基本是引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版)中的数据。

此种影响非常有限^{[4]79-113}。

虽然施坚雅与罗兹曼的研究模式与观点,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整体上看,施坚雅与罗兹曼对中国城市研究的时间段,侧重在20世纪之前的19世纪或者说以前更远的年代,较少直接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化。虽然中国19世纪末的城市化与20世纪上半期的城市化之间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但是在20世纪初大机器工业生产采用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不论从速度还是从范围来看,都加快扩展了。与施坚雅、罗兹曼不同的是,墨菲的著作本身并没有直接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化,它只是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两种视角直接解剖了中国城市主义(生活)的特性与条约口岸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这三人的论著都没有直接论述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化。但是,卡蒂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中,直接把罗兹曼、施坚雅与墨菲对中国城市的三种研究模式与观点,看成是西方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三种模式^{[5]24-46}。不过,严格说来,西方对中国近代城市化进行宏观研究的,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施坚雅一人,而施坚雅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基本止于19世纪末。

纵览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颇多,然为什么唯独对同一时期城市化却很少涉及?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对20世纪之前中国城市宏观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中,有两个著名学者罗兹曼与施坚雅,而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宏观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除了墨菲,似乎就没有了。而后者,也没有直接从城市化这一角度来研究那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没有出现主要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学者,也没有整体城市化研究成果出现。从历史学说,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属于城市史范畴,严格说来是城市化史,然历史学者却很少涉及该领域,从城市地理学来说,地理学者也较少涉及。对此,地理学家马润潮先生的解释是,“没有全国的城市统计数据,难窥城市化全貌”^①。这一点也许说得通。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是不是因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本身就不发达,文献少,而西方研究就很少呢?

(三)感知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

整体看来,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很少,更不用说有一些直接关联的城市化观点与理论了。笔者曾试图通过分析西方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来了解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目的,看来不能完全如愿。不过,既然不能从正面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那能不能从侧面进行了解呢?19世纪末中国城市化为6%,1949年为10.6%,在20世纪上半期近50年内,中国城市化率上升了4.6%。尽管以今天眼光来看,那一时期城市化不像如今发展的那样快,但是城市化毕竟还是向前发展了,因而,这种城市变迁会或多或少在城市史料中展现出来。的确,尽管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直接研究很少,但是,不少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尽管缓慢但让人能感觉到的城市化潜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病”现象。如此论著不在少数,下面仅举例说明。

例如,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等论著,都论述了近代上海移民情况。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这个城市中,移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有广州移民,宁波移民,江苏—华北移民等。上海的劳工大多数是外来的,其中,广东木匠、宁波铜匠和苏北盐城的黄包车夫在上海都是非常有名的。从上海这个中国20世纪上半期最西化的城市中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化,尤其是人口城市化暗潮的涌动。再如,从韩起澜《姐妹们与陌生人:1919—1949上海纱厂的女工》论著中^②,可以感受到中国20世纪上半期城市化对农村社会有一定影响。那一时期,在上海纺纱厂有很多外来女工,这说明即使是在那个半封建的年代里,也有不少女性农民工进城打工养家糊口。众所周知,在前近代中国社会里,尤其是封建性浓厚的农村社会中,女人是很少进城的,更不用说在城市里长时间的工作了。而到近代,尤其是20世纪初大工业生产在大城市出现之后,或许是因生存压力,或许是因对美好生活的预期,出现了不少女性农民工进城做工的现象,此种现象与当代女农民工进城打工,有某

① 这是笔者与马润潮先生探讨这个问题时,后者所作的解释。

②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种相似性。同时,从西方有关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在那一时期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即“城市病”,诸如棚户区,有组织犯罪等现象大量存在。安克强、贺萧、魏斐德、马丁、卢汉超等人对妓女、流氓(青帮)、乞丐、游民等诸多城市下层人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研究那一时期的城市化,但是这些研究无不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有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在这个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因同一时期工业不发达,吸纳能力有限,不少进城农民为了谋生,从事非正当职业,诸如女为娼妓,男为流氓、混混等。诸如此类种种现象,都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病”的典型表现。从城市化理论上讲,“城市病”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使得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容纳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不少人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可以看出,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比之于同一时期的工业化,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因而这种城市化属于“虚假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是非正常的,具有浓厚的畸形色彩。

三、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现代化

城市化研究一般是超出单个城市,在一个更大区域内来考察的。虽说西方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区域城市化、整体城市化研究很少,但却对同一时期的单个城市研究却比较多,尤其以上海居首,这一点仅从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就可以看出。在单个城市中,上海研究一度成为海外研究的热点,其次是天津、汉口、广州、北京、成都、重庆、济南、哈尔滨、大连等。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展,现已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国边疆城市的研究成果^①。不过,总的看来,可能是因史料相对较多一些的缘故,西方对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研究较多。对此,如前所述,相关综述已有不少,本文就不再赘述。在此,本文只想从这些单个城市史论著中,看看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单个城市内在现代性的发展,即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内涵提升的程度如何。

首先,城市经济的现代化。

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最能体现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应该是那一时期中国的通商口岸。墨菲有关中国通商口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是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条约口岸城市对当时中国来说,都是新的,因为它们基本是现代西方商业—工业城市的复制品,其银行,保险,通讯,股份公司,保护个人财产等制度与西方是一样的。这些新事物,尤其是保护个人财产,个人企业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亘古未有的好事。于是,很多中国商人涌入条约口岸,扩展自己的商业事业”。就是在这些通商口岸,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并得到了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缺乏重大变化的国度里,西方工业技术在条约口岸展现出来,使得这些城市看起来像是变化,进步与发展的中心。就是在条约口岸,中国工业化开始启动了,并在那里集中进而得到发展,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6]26}。墨菲认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通商口岸是那一时期中国的“飞地”,其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只局限于特定城市及周边地区,而对中国广大内陆腹地影响却很小。不过,正是这些通商口岸现代性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可贵的物资、人才、技术等基础。

其次,城市政治的现代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罗威廉有关 19 世纪汉口的两部专著,在西方学界引发了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有没有“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大争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一词因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论著而被概念化了。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就哈贝马斯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政治社会,是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

^① Piper Rae Gaubaz: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罗威廉、玛丽·兰金和大卫·斯特兰德等人认为^①，在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有诸多现象可以表明，中国城市不仅出现了“公共领域”，而且还不断得到了发展。大卫·斯特兰德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例如，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政府权力日渐式微的状况下，城市地方精英，尤其是商人，通过行会（会馆）、公所、商会、商团等组织，对城市中诸如赈灾、消防、马路扩宽等市政事务进行管理，旨在解决“早期现代化的城市所面临的史无前例而又异常特殊的城市问题”^{[7]145}，而这些自治组织管理城市现象越来越普遍，其管理权力逐渐超越一般事务，对政治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渐对城市具有一定控制权。从个体来看，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力。然而，他们认为那一时期中国或存在“公共领域”，或存在“市民社会”的观点，遭到了魏斐德、黄宗智、法库豪尔、何伟亚等多数人的反对^②，后者认为虽然在清末民初时候，中国城市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带着现代民主化色彩的新政治生活，但是要用以“西方化”的概念来加以研究与描述，有些言过其实，也是不恰当的。尽管如此，此后西方学界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大多受到这两个概念的影响。其实，反对用“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中国城市政治的学者，并不是要否认那一时期中国城市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民主化现象，只不过，他们认为中国这种现象与西方近代早期同类现象相比，远远不如后者民主化程度深。所以，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中，其政治生活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变化，即使这些变化与西欧近代早期的变化并不完全相符，用西方语境下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值得商榷，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这个作为现代化的载体，具有与欧洲近代早期“城市的共同之处”^{[7]145}。这些“共同之处”，就是中国近代城市政治现代化的表现。

再次，市政改革与城市空间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机器大工业、大工厂的采用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自身管理与空间日见窘迫与局促。在这种状况下，对城市原有管理机构与城市空间进行改革与扩展，就成为必然。司昆仑《走向文明：中国城市改革：1895—1937》，安克强《上海 1927～1937：市政权力、地方与现代化市政权力》，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 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等论著^③，就是阐释这种背景下，19 世纪末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所做出了一些应对性的变革。在此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政府、市政概念和管理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传统城市空间被打破，逐渐向现代城市空间演变，诸如很多城市相继拆除城墙，城市公园与广场在一些比较发达城市出现。20 世纪上半期，城市中所出现的市政府、警察、城市公园等典型现象^④，是那一时期中国城市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向现代化迈进最好的注脚。

最后，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

在西方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这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近代以来，诸多力量的合力，使得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及以人服务的卫生、教育、娱乐等出现了现代性的嬗变。例如，罗芙云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展示了 1900—1928 年间天津城市在卫生管理和卫生观念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现代性，同时也指出了该城市在卫生管理方面的不足^[8]。现代性的教育体系、现代性的文化娱乐等在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现象，在不少西方相关论著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城市这方面现代性的捕捉，比起与城市在经济、政治、市政与空间等方面现代性的捕捉，要相对容易一些，然对于前者，却很难

^①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Strand, David: *Med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sion: Local Elites in 1920s Beijing*, pp. 216~235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hus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②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以及魏楚雄《挑战传统史学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史林》，2008 年第 1 期。

^③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有关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城墙拆除、公园开辟的相关研究还有不少，具体目录可以参看《城市史研究》23 辑中史明正《西文中中国城市史论著分类要目》一文。

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因为前者相对微观。正因如此,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与文化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说明了现代性在逐渐深入城市社会的单元“细胞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发展中的城市社会,的确是有别于前近代传统城市社会了。

与城市化一样,西方直接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的论著并不多,不过,从众多有关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史论著中,还是比较容易地感知到那一时期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脚步的。

四、余 论

总之,要了解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看法,主要是靠从相关论著的侧面而感知。审视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论著,从中确实能感知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可喜而又缓慢的发展。但是,这种靠感知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是非常有限的。或许正因为其不发达,发展不明显,其相关数据,其相关档案比较少,研究起来难度大,所以,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没有出现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整体城市化的论著。一般来说,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互促共进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有限,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同样也是有限的;经济现代化只局限在通商口岸及周边地区;正因为政治现代化的有限性,才有部分学者反对使用“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那一时期中国所出现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城市政治生活;在市政改革与空间变化中,城市中的传统力量往往大于现代力量,使得改革常常步履蹒跚,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目标;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也是有限的,卢汉超认为即使是在上海,在这个中国最具现代化特色的国际大都市里,大多居民的日常生活是远离繁华的南京路的,过着一种比较传统的生活,即受现代化的影响较小^[9]。从地理空间上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沿海、沿江的那些通商口岸城市,因此,不论是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都是有限的。

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这个政局动荡不堪、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其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在夹缝中仍顽强地向前发展,这种发展,犹如在黑暗天空中几颗闪光的星星,尽管它们的光是那样地微弱,但还是能给人带来欣慰。

参考文献:

- [1] Glenn T. Trewartha: Chinese Cities: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M], Volume 41, Issue 4 December 1951, pages:331-334.
- [2] 德·希·铂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3] 罗兹·墨菲.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4] Susan Mann, 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J]. 1984,10(1): 79-113.
- [5] Carolyn Lee Cartier, Mercantile Citie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Ningbo, Fuzhou, and Xiamen, 1840—1930, Ph. D. dissertation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8.
- [6] Rhoads Murphey, 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 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M]. Methuen,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1980.
- [7] 黄宗智.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8] 罗芙芸. 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G]//城市史研究.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5—16辑).
- [9] 卢汉超. 远离南京路——近代上海的小店铺和里弄生活[G]//城市史研究.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3.

责任编辑 张颖超